

# 汉诗现代化新论

吴仁援 著



其内涵确认与外延界定历来有诸多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指以现代方式来表现现代人感情的中国诗歌，包括一五四以来产生的中国新诗和旧体诗，容纳了各种各类艺术表现方式。也有人认定它是以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表现方法来传达、表现自身感情的，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并行发展的诗学艺术创作潮流。还有人以为，中国现代诗潮即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其实，一现代汉诗一就是指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区别，一五四以来产生的中国白话新诗，其诞生、发展、变化，始终与中西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与整个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而20世纪汉诗现代化进程里，所有从形式、内容、方法、观念等方面作出现代性的探索、实验的诗人、诗作、诗论、诗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归于我们今天思考、探讨汉诗现代化的研究范畴，审视视野。

即使二三十年代就有人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几个现代诗人的创作也一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二，即使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明确表示一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我一古块大洋三；一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一迄无成功四，我们还是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科学、客观的原则，以事实为证，以历史为本，用自己的双眼去审视这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仁援  
著



汉诗现代化新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诗现代化新论/吴仁援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633 - 6349 - 1

I . 汉… II . 吴… III .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20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75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 导论 “峰”“岭”之间话“上山”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中国社会旋乾转坤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文化崩天裂地的一百年、中国文学改弦易辙的一百年、中国诗歌登峰越岭的一百年。

努力! 努力!  
努力望上跑!

读着胡适的《上山》,耳旁仿佛响起了“五四”新文化“开路先锋”当年那翻山越岭、登峰爬坡的铿锵脚步声。这一百年中国人民向着现代化宏伟目标迈出了可贵而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百年中国文学真正挣脱了漫漫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禁锢、封建文化的束缚,这一百年在被称为“诗国”的国度里诗歌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无论是诗人、读者,还是文论家、诗评者都已渐渐习惯于将这百年间中国焕然一新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或“现代汉诗”。假设百年、千年之后的人们,他们再回观、总结、评说、界定我们曾置身、经历过的 20 世纪,会发现毕竟是这批“别树一帜”的诗歌引领着汉诗乃至汉语言文学踏上了“现代化”的艰难而伟大征程。简言之,它们与以往历代汉诗最显著的区别性标志就是两个字——“现代”。

而要对这批冠之以“现代”的汉诗作出研究与认定,就必须首先面对“现代性”、“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学现代化”、“汉诗现代化”等概念的内涵、要素,至少必须对其外延有一个基本的划定。否则,基本衡量尺度、评判标准的含混、缺失必然使所有由此延伸下去的对具体问题的探讨都成为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

“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是指社会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

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它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现代性”并非随现代社会同日而生，其外在化历史存在方式就在于其断裂性。“现代性”这个词在19世纪才出现。这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性”的体认层面不断丰富、扩大：社会学意义的“现代性”是指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生活。人们把从17世纪欧洲开始的、直至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叫做“现代社会”，把这个衣食住行都与古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后的特征叫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涉及科技（设法建立现代化科学与技术体制，并在这一体制参照下激活古典科技传统）、政体（将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以引发种种政体变革）、思维（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道德（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教育（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法律（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律）、学术（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建立现代学术体制，涉及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等。哲学意义的“现代性”是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被一种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性精神所支配的新的生存状态、思考方式、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这种现代理性由工具理性（科学）与人文理性（自我价值）共同组成。理性精神的统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而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核心，是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动力。从最广泛的思想发展变化的意义看，历史上的“启蒙”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自己的主人、世界的主宰。而在理性几乎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工具的时代里，现代性的人文理性最充分地体现为一个鲜明的信念：人的理性才是人类命运的主人，而非先验的神。现代性能够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改变，也能使个人改变自我现状、满足自我渴望、探索自我发展、达到自我目标、完成自我重塑、实现自我独立。其选择的自由是与承担责任同时存在与发展的。现代性充分肯定个人追求自己精神、物质、情感的需求。而个人的改造又是与世界的变革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通过思想与行动，现代的个人以细微的方式改变着自己和世界。

现代性最显著的精神品格就在其反思性：“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

种态度使得掌握现在的时刻的‘英雄的’方面成为可能。现代性不是一个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感性的现象；它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sup>①</sup>在福科看来，现代性是为了将飞速的时刻保持住或永久化而被视为神圣的。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现代人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发现自己的秘密。他不但是发现自己隐藏的真实的人，而且更应该是努力创造他自己的人。现代性促使人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自己，也激发人不懈怠地担当起生产、创造他自己的任务。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列奥塔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sup>②</sup>。这种思想方式是为某种“解放的观念”所支配的。这种“解放的观念”即康德所说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于一个终极目的，达到一种普遍的自由王国。“现代性”是一种“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sup>③</sup>。无论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意志”，还是一种“叙事”，都表明了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

现代性最鲜明的思维特征就在其批判性：“现代性”与身俱来地表现出对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叛逆精神是其核心。它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性功能，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现代性张扬一种对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强烈、更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现代性的批判性思维总是奇怪地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而其社会理想却并非单一的朝前看。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现代”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于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它对“现代性”既爱又恨、既肯定又否定。它对“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进步予以肯定而对其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所正视的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到现代性

<sup>①</sup> 福科《论现代性》，引自汪晖、陈谷燕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430—431 页。

<sup>②</sup> 列奥塔《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1 页。

<sup>③</sup> 列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序言部分。

的命运,更关涉到人类社会的前途。“后现代”意识是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局限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它在经历了“启蒙(反传统)一后启蒙(反省反传统)一非启蒙(复归传统)”的过程之后也许会推进“现代性”步入一个更新、更高的层面。

现代性最重要的价值根基就在其普世性:“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意识更是精神倾向的概念。它在某一时期被人们使用,并不仅仅属于这一时期。现代性代表的是人类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基本的理解方式与创造方式,它可以属于任何时期,也可以属于任何个体。精神历史从开始起就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正是这样,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才能确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能遇到它,感觉到它的活性动力,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相对传统,现代是一种“与时俱进”式的优胜劣汰中的新的综合、新的质变、新的飞跃。相对陈旧,现代追求创新;相对封闭,现代趋向开放;相对恪守,现代大胆超越;相对凝固,现代努力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和谐。现代性不是一种终结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的延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载体,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这之外别无他路可走。“现代性”本身需要不断反思,需要不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sup>①</sup>。

“现代化” 在社会学领域里,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指较不发达社会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它是社会按照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对本土文化的一种价值重塑,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工业化为模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总体性社会变迁。它具体表现为从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sup>②</sup>这种变革体现在物质经济、制度规范、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心理状态等所有领域,并使那种合理化的科学和工业主义精神渗透、体现

<sup>①</sup>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156页。

<sup>②</sup>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0页。

于所有领域之中。这一社会变革过程又必然是由国际之间或社会之间的交流所促使的。现代化是具有一系列与传统相对照或对立的性质和特征的。它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个过程，也可表现为一系列可以测度和描述的指标。其变革特征不仅表现在技术上、组织上的创新，更深刻地体现在经济上（包括技术上）、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种种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之中。这些交互过程往往是区域性的、部门性的，并且几乎总是有限的、局部的、渐进的与递增的。通过这些指标既能描述出一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出该社会各领域、各部门现代化程度的不平衡性，如果把一套指标系统与其性质、特征、发展过程综合起来，就能更完整地理解现代化：相对“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乡村、迷信、集权、蒙昧、圣典等，“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都市化、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世俗化……这大致可呈现出“现代化”和“现代转型”的一般涵义。

假如说现代性侧重的是“现代”的横向展示，那么现代化则更多关注的是“现代”的纵向发展进程，是一个有着较为明确起点但尚未到达终点的演变进程。现代性更多地是在欧洲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可以说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却并非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唯一结果。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现代化”** 就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而言，现代化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实现国富民强社会理想的过程，尽管这种理想在被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中会受到本土传统的反击，但它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力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改造着生存的状态，树立起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与西方的语境毕竟不同。深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现代性反思，使我们不得不把既往的社会经验视作一种实践现代性的方案，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文化认同。面对中国国情与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理论可以取舍、规划、建构，同样我们的道路就更能够选择、取舍、规划、建构了。百年以来的中国选择了现代性目标，同时又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现代性却正处于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阶段。中西社会之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差距。而中国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

一个纯粹的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用现代性标准取舍“传统性”的复杂而特殊的过程。“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面临着一种旧与新的混合”<sup>①</sup>,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特殊性正在于此。“混合”勾勒出了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的曲折轨迹,而现代化就是这些彼此相互冲突的力量所产生的结果。现代化是具有一系列与传统相对照或对立的性质和特征的。它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个过程,也可表现为一系列可以测度和描述的指标。它基本上是变革,但并非仅仅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创新。现代化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是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此定义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西方经验与现代化根本原则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更多地考虑到亚洲的后发国家。这一诠释性定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分有效。人的工具性和物化与现代化及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因而受到不断的质疑、激烈的批判。

“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sup>②</sup>20世纪以来,尤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仅仅盲目地、全盘地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行的。虽然现代化的母本是西方话语,但我们所不懈探索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道路。非现代国家要试图变成“现代”国家,其首要任务就是叙事,即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有序、层次分明的既沟通世界、更显示国家特征及民族特色的现代话语中去。在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与反复,尤其是接受了错误思潮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后,中国人民逐步确立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在“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自主创新”中向着“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中国文学现代化”** 中国文学现代化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

<sup>①</sup>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页。

<sup>②</sup> 弗·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523页。

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众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国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sup>①</sup>。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一个被称为现代的(相对于古典的)文学新质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并不受制于某种确定的政治或文化本质,更不是某种政治革命或文化潮流的简单演绎、直接外化。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人们开始通过“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sup>②</sup>等来寻找一种贯穿始终的某些内在的文学因素,并用以说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有机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构设一个新的整体研究文学史的框架。这种整体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研究的割裂状态,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一个革命性变化,但是其对文学所作的历史阐释却仍然囿于某种单一的角度。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庙堂”、“广场”、“民间”鼎足三分说、“共名”与“无名”说,力图摆脱上述整体观照下的单一视角,以避免片面性的凸现、肢解、隐没和忽略。这些新的阐释角度把现状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阐释摆脱了此前流行的政治或文化本质论的控制,给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

作为起始点,中国文学现代化首先接受了西方社会在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化成果,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乃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并且利用这些精神文化成果所独具的现代性特质、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承担起反对封建文化、建立现代理性的启蒙任务。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最重要主题是:如何最终挣脱西方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和自由。这就使人们常将自己从西方接受的精神文化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现代化已经表现出某种批判性因素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潮流,转换成反对西方的精神文化资源,这显然会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产生相当影响。在现代化尚未获得一个独立发展的前提时,中国文学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后

<sup>①</sup>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sup>②</sup>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果(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批判倾向。民族危亡促使文学艺术中的倡导自由民主和个性独立的启蒙意识逐渐为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政治意识所代替,这可谓另一社会意义上的“启蒙”。它开启了中国国民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前提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性(现代化)所进行的批判,有助于确立现代化的民族主体身份,选择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当这个前提问题已解决,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依然坚持对西方现代性(现代化)的这种全面批判,这也许主要是受到一种历史的惯性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影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从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和平建国时期。这一状态结束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又开始了“启蒙现代性”的重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文学的人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文学的主体性”等,这是文学启蒙意识再次觉醒的具体表现。这种“启蒙现代性”的重建,又一次使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成了中国文学在新的阶段上的现代化追求的思想文化资源。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某些普世性价值原则,在中国文学中又一次得到了时代性确认。它为启动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确立了新的价值理性。这一阶段“启蒙现代性”的重建,开始以一个平等的主体身份真正加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而此刻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时期,所遭遇的正是由这种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所孕育的“后现代”(在80年代一般误读为“现代主义”)的文化情境。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改变,促使许多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新的人生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产生。这些新观念体现出鲜明的反“启蒙现代性”(包括现代主义中某种发展了的“启蒙现代性”)特质,是以战后科学技术和现代资讯迅速发展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为背景的。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追求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和悖论:一方面重建“启蒙现代性”,必须高扬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受反启蒙的后期现代性的影响而难免要瓦解这种“启蒙现代性”赖以成立的理性基础——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和以各种冠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前卫的文学实验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正是这种共时地存在的前后期

现代性因素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不但在诸如经济、科技、法制、管理、资讯和公共事务等方面获得了许多共同性的基础,而且在诸如对待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消费文化潮流和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环境、人口、宗教和文化冲突等)上,也获得了许多共识,出现了许多价值上的认同。所有这些共识和价值上的认同,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化在现阶段的表现(即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批判性的审视是从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内部对因现代化而造成的诸多负面效应所作的一种反观和自省。由于这种批判性的审视仍然是来自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因而仍然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现,是现代性问题在现阶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的一些新锐创作往往有这种摒弃政治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现代性因素的体现。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加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意识,也开始站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开始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中国文学现代化固然要比照西方文学现代性的基准和特征,但更需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性质、状况的特点和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化”的固有特征。在民主替代专制、人本取代君本、科学驱逐愚昧、发展打破僵化的社会条件下,文学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现代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更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文学表现形式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

一是人的自觉。由于中国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历程,没有在西方批评语式中堪称健全的“近代性”文学形态,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必然担负着更为沉重的历史任务,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倡扬人文精神和反封建的内容。人与人的解放主题受到空前重视和自觉表现,并赋予其时代涵义。“文学即人学”,把人的地位抬升到至高无上,第一次自觉地把人看作文学表达的终极旨归;不同于以往,现代人对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人的主体性(包括为我的目的性、主观应当性、自主性和自由自觉的创造性)、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上。这不同于中国古代以人对外在伦理道德的绝对服从、西方中世纪以人对宗教神权的彻底膜拜为文学的指导思想,现代人在文学中

所要表达的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主题是人如何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关系中全面解放出来,走向最终的自由。这是文学是否走向现代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摆脱了社会功利主义的重负,能够更为努力地追求其自身的艺术审美价值,独立地承担审美创造与审美批判的职责与重任,进而使文学艺术真正成为现代人领悟生存意义的途径之一。这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获得实现。它是现代人超越现实、实现精神自由的特殊生存方式。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包括生存环境、社会主题、文化阶段、受众需求)提供、要求适合中国文学表达的主题,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对“荒诞”、“异化”的表达不尽相同,但与“人”、“人的解放”等具有共同指向。

二是文学的自觉。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以白话文为语体特征、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主体是现代社会产生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主要由他们创造了有别于过去中国任何历史时期的现代雅文化与俗文化。“雅文学”、“俗文学”各自流行、发展,更为高雅、精致的超越性追求与更为通俗、趣味的休闲类需要成为它们各取所需、各显神通的价值取向的显著标志。这种以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效应,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为时代职责的“时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坐标。它们以广场、庙堂、乡野的不同文学语境,以交织、互补的方式共同树立起以启蒙、革命、民间为价值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形式因素(创作方法、表达方式、艺术风格等)受到空前的重视,其文学本体地位逐步确立。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形式有本质的不同。古代文学的重形式是力图让形式标准化、单一化,是文学规则的自我肯定、修补和强化;古代文学的经典、规范往往具有相对而言的保守性。而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形式是力图打破陈规、创造形式,是力求突破、创新、超越、变革、解放。

三是审美的自觉。世界范围文学对话的迅速扩大促进中国文学不断创新、前进。中国现代文学为国民与民族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审美熏陶,这是从人生的艺术化出发去追求民族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以强烈的人本意识、开阔的人际视野、痛切的人生感受、健旺的人格力量、丰富的人情世态等显示出文学创作主体时代性、艺术性、审美性追求的独立与独特。它完成了对传统文学的叛逆与反抗,融入了与世界现代化的对接与交流,显扬出主体精神、时代意识、开放气度等现代审美特

质。它以人性、自由为其内核,以积极向上为其精神面貌,以对接世界为其开放视野,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为其时代职责,以激情洋溢、爱情喷涌、春情怒放、悲情升华等为其基本抒情形态,以感性、个体、内倾、多样为其审美追求,以更新、创造为其艺术创造的前进动力……它不断努力追求全新的叙事方式,意识流、心理时空、内心独白、多元叙事等层出不穷。中国文学现代化并非排斥自己民族的一切文化传统而将一切外来文化视为“通灵宝玉”,而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综合并发展中外古今文学精华。其审美创造、追求是受到 20 世纪中国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诸多要素影响的结果。它既外应了世界潮流,又内承了民族传统,是在自己的不断尝试、不断探索、不断更新、不断丰富中逐渐形成现代文学的“中国特色”的。

**汉诗现代化** 其内涵确认与外延界定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指以现代方式来表现现代人感情的中国诗歌,包括“五四”以来产生的中国新诗和旧体诗,容纳了各种各类艺术表现方式。也有人认定它是以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表现方法来传达、表现自身感情的,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并行发展的诗歌艺术创作潮流。还有人以为,中国现代诗潮即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其实,“现代汉诗”就是指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区别,“五四”以来产生的中国白话新诗。其诞生、发展、变化,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与整个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而 20 世纪汉诗现代化进程里,所有从形式、内容、方法、观念等方面作出现代性的探索、实验的诗人、诗作、诗论、诗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归于我们今天思考、探讨汉诗现代化的研究范畴、审视视野。

即便 30 年代就有人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几个现代诗人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sup>①</sup>,即便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明确表示“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sup>②</sup>,“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sup>③</sup>,我们还是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科学、客观的原则,以事

① 《鲁迅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3 期。

② 毛泽东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22 页。

③ 毛泽东《致陈毅》[1965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608 页。

实为证,以历史为本,用自己的双眼去审视这百年来汉诗现代化历程。尊重历史、正视当下是为了更好地瞻望未来、创造明天。一百多年来汉诗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数量可观、质量可圈可点的丰硕成果。据198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作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至1987年这七十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歌评论集306部。从整体倾向上看,20世纪中国文学、汉诗的发展变化趋向是偏离传统、走向世界,打破权威、崇尚个性,挣脱束缚、追求自由。因而,其基本走向是趋于现代化的,其总体性质显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就“五四”以来的汉诗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还是唯美主义诗歌、象征主义诗歌、现代主义诗歌,以往一些诗论者不是壁垒森严、脱尽干系,就是东拉西扯、趋炎附势。其实它们无论哪一派、哪一流都无法完整、全面地代表现代汉诗。20世纪汉诗现代化是由这众多繁盛的诗歌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共同构成的。

纵观以往叙述汉诗现代化论著中常见的“叙述格局”,不是以其在20世纪的发生、发展轨迹为主要线索,就是总体叙述;不是切割为若干年代作时段性论述,就是按流派、“主义”划分为若干思潮而分类论述。对某种内在演进、辩证发展的逻辑的强调,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的一个主要趋向。这种“纵向线性叙事”自然有文学历程知识积累与传授的实用性、方便性特征,但诗歌作为一种尤其讲究灵感、个性、特色乃至许多偶然性要素的文学艺术样式,单一的线性描述、纵向铺展及其规律抽取的方式往往忽略了诗歌发展变化在共时情况中的繁复性、丰富性、厚重性。在回眸刚刚过去的百年汉诗发展时,我们“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sup>①</sup>。逻辑的展开并不能等同于事实的本然,汉诗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共时性的交错、偶然乃至矛盾、冲突,也许很难由单一的历时性线性化叙述手法真正有效地呈示。“范式”的稳定,难免沉积、固化为某种制度化的“流程”,也许同时带来某些封闭性。“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能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sup>②</sup>而从“文学性”角度来与小说、散文、戏剧

<sup>①</sup> 雷内·韦勒克《文学史上的演变概念》,《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49页。

<sup>②</sup>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页。

相比,诗歌又以其自身特有的文学审美的“纯粹”性,来显示其艺术思维的“尖端”性。20世纪的汉诗更集中、更典型、更鲜明、更强烈地显示出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性探索。

为进一步揭示20世纪汉诗的丰厚本质,也为更多维地展现汉诗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更为以“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精神来审视中国现代诗人们的勇敢“尝试”,笔者力图用横向铺展、纵深探究、点状描述、线性勾勒及理论论述与创作成果相结合的方式换一种视角展示并思考20世纪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在“峰”“岭”之间看“上山”、论“上山”,或者可以说是自己“努力”在现代汉诗评论征途中“上山”,从诗歌的文学精神、特质要素、语体文本出发,对汉诗现代化的发生、发展、变化,提供一个新的阅读习惯、思考空间、审视视角、规律抽取的可能。因而笔者欲从汉诗文学精神的现代化(“人”之“声”、“时”之“声”、“民”之“声”)、汉诗特征要素的现代化(“情”之“异”、“思”之“异”、“象”之“异”)、汉诗语体文本的现代化(“语”之“新”、“韵”之“新”、“形”之“新”)等方面来论述自己对20世纪汉诗走向现代化的认识、理解、思索、检讨与评说。

我头也不回,  
汗也不揩,  
拼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  
努力望上跑!”

## 出 版 说 明

该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通过这些选修课教材的建设,达到如下几方面的目的:

一、促使教师科研成果转化本科教学的内容,增强本科教学的学术含量。

二、更新选修课的教学内容,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基础教学结合起来,拓宽本科学生的学科视野。

三、使本科学生掌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方法,提高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培养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上海大学中文系正在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而努力工作。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中文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期盼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系列教材  
编辑委员会